

中国工业化理论

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贡献

王毅武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是通过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阐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形式的理论，其核心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并在实物上得到替换的，亦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社会总产品能否顺利实现的两个关键性条件：其一，产品的价值构成是否合适？其二，产品的实物结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合乎比例）？这两个关键性条件实际上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衍生出来的，即：（一）社会产品从价值形态上分为 c （不变资本部分）、 v （可变资本部分）和 m （剩余价值部分）三个部分；（二）从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实际上，这两个关键性条件如果不在实践中得到妥当解决，社会再生产还将遇到若干麻烦。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并未研究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及其过程，也没有论及他的社会再生产学说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就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留下了一块“理论天地”。

在1912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首先系统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她认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并第一次把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用三个方程式表示了

出来，即：

$$1. I(C+V+m) = IC + IC_1;$$

$$2. IC = I(V+m);$$

$$3. I(C+V+m) = I(V+m) + I(V+m).$$

罗莎·卢森堡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存在着两个部类的划分；两个部类间的平衡关系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同样地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具有客观的社会正确性”^①“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作适当的修改后，对于一个计划社会，也具有客观的正确性。”^②她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中也存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观点。

当然，1893年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就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个论断，是马克思所不曾明确提出过的，是列宁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重要补充。但是，列宁当时只是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存在这一规律，而没有谈及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存在这一规律。1913年，列宁读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之后，草拟了题为《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不成功的补充》^③的提纲，打算批判卢森堡的某些错误观点，着重分析资本积累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在此前后，还草拟了四份《说明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总产品结构变化的表式》，^④对比分析了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个形态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

产品的状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也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实际完成。

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1925年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开始,1928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于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是否正确开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得到验证。

二、三十年代,一方面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未全面展开,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理论界曾一度把社会主义绝对化、理想化,既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被认为或者是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或者是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29年10月,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公布。列宁在书中的第一句话便是:“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并指出,就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是存在着“ $I(V+M)$ 和 $II C$ 的关系”。^⑥这就重申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并再次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并且还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从此,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被提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程上,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1929年12月,斯大林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论证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出:“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⑦这样,斯大林就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具体地联系起来。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不

仅再次重申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有经济规律。随后,理论界出现了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绝对化的倾向,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如何安排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等同起来,把规律的客观性混同于操作的自觉性,价值规律受到排斥,计划的客观依据被淡化,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仅仅成为几种被简单化了的基本公式和比例关系。

在我国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一般都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一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把计划放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三是把复杂的社会再生产问题简单化。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几乎都遇到了程度不同的麻烦与困难。

1956年4日,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的经验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为“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⑧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提出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这是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⑨这里,毛泽东虽然也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浓缩并具体化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但是与斯大林的认识相比,还是要前进了,因为此时不仅已经有了苏联的经验与教训,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怎样走出一条既快、又好、又省的工业化道路来,比起苏联要更清楚、更客观一些了。

从过去了实际情况看,几乎世界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经济落后国家转变而来的,因此初期都面临着一个实现国家工

工业化、迅速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严峻局面。在中国，基本的事实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国家获得独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样，中国工业化的前提及意义，当然地也就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的口号。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国家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自己发达的工业，特别是没有作为整个工业发展基础的重工业，就谈不上以强大的工业来改造全国范围的落后的农业，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因此，“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①这里，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很自然地也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并主要地表现为工业化理论了。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后，又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于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国家计划中投资的比例如何安排问题。因此，又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思路与斯大林从总体看并无大的差别，都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亦即市场问题，或者说是排斥商品经济，因而在我国一再出现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主要特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反复摩擦及巨大缺口，出现了“按比例、常失调”的再生产怪圈。

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往往是理论发展

与完善的动力。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在中国具体化为工业化理论之后，由于多次出现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因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就成为工业化理论的重要补充。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亦即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中实现条件的具体化，这就从把两大部类具体化为农轻重，再把社会再生产具体化为工业化途径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不只是抓住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核心，并且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一大发展。

实现工业化的方针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特色。这里所说的方针问题，实际上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取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基础；其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应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点，积极争取外援；再则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更加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②科学技术是工业化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要建设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秩序安定的新社会。这些，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都是没有论及的。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实现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条件都极为重要。可以说，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既是整个国家振兴图强的过程，也是向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水平学习的过程。世界性经济交往的普遍发展与生产

力的迅速提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应当说这个问题更显得真切与紧迫,即参与并进入世界性经济交往更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实,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完全无视国际环境,忽略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来迅速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实质上是自我扼杀。只有面向世界,改革开放,才是富民强国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更高层次、更大步伐、更有实效地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理论在这方面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如建立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外资、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等,不但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而且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

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问题。由于我国工业化理论曾一度忽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因而使得自己的理论出现了某些缺陷或扭曲。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不仅面临一个国内市场问题,而且面临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五十年代,世界分为“两个对立阵营”的观点促使我国的工业化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平行但也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加之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我国的工业化只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在国内市场问题上,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认识问题上有偏差,因而也给我国工业化的实际进程造成很多不利影响。虽然其间市场问题不断地被从各个角度提出来,但从总体上看,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和科学地研究。这些,都是我国工业化理论应当认真反思并完善的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业化理论注意到了并开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从若干方面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而且明确提出我国工业化应建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为马

克思再生产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内容。

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包括产业结构的改造、特征及战略理论,是中国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又一大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是指较长时期内的依据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根本性措施与关键性步骤的概括或总和。如何实现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科学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保证加以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增添了崭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简称“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从经济发展的全面看,无论是发展速度,原有产业结构改造,还是经济效益都比较好,举国上下确实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再生产有血有肉,有条不紊,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久,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变化,开始以发展速度为中心,提出“超英超美”。不切实际地要求在15年内使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然后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后来甚至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使中国从此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不但工业化受到挫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少地方与部门甚至出现严重困难,整个经济失调。后来经过调整,于1964年提出“两步设想”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然包括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执行到60年代中后期，单纯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又占了上风，社会主义再生产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难以维继，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失误，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又提出了“洋冒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四个一点”之下规划了一个过高的到2000年的设想，急于“买”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内经济各重要部门的发展再度出现失调，结果是欲速而不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转到以调整经济结构（包括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上来。在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时间跨度为7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从而又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充实了新内容。可见，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或者实现工业化的总方略，为社会再生产规定了重点与要求，这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原来所不曾有的。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关于再生产类型分析。当时，马克思曾把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并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不仅把经济效益（包括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而且看作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这就更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学说升华了一步，并且还把经济效益与发展速度联系起来，

从而使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更为丰富。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很有特色。概括地说，就是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此外，关于经济调整理论，可以说也是要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中国工业化理论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理论上说，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不仅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深化了再生产的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平衡问题，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中的实现条件问题，并且从方法上、操作上都具体化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学说的创新和充实，而且以经济效益为实质实现了理论上的升华。若把中国经济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结构、速度、效益、步骤、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归纳进来，足见中国工业化理论之丰富。中国工业化理论从实质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延伸和具体化，即要在高度社会化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富民强国，从而逐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过渡。这是具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经济理论，值得我们认真总结。那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没有多少可研究的“内容”，也没有多少中国“成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②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6、第87页。

③④1975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列宁文集》第38卷。

⑤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第2—3页。

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9页。

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400、268页。

⑩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56年）。

（责任编辑 徐云鹏）